

# 萧绎与萧纲文学思想的同异 及其创作的影响

张亚新

---

萧绎与萧纲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有不少趋同之处。对于文学的特点都有比较明确、深刻的认识,这是两人文学思想最为趋同的一点;两人都创作了大量的宫体诗,都是宫体诗的代表诗人,诗风都颇绮艳浮靡,这是两人在创作上最为趋同的一点。但两人的文学思想也有并不一致的地方,比较而言,萧绎“文”的意识更为明确、强烈,对“文”的特征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入,对文质兼美更为重视,而萧纲对传统文风的批判态度更为激烈,对宫体诗的地位也更为推崇。反映在创作上,萧纲在宫体诗的道路上也走得更远,词采也更为富赡华美。

---

萧绎与萧纲是南朝梁中叶后文坛的重要作家和代表人物。萧绎与萧纲是同父异母兄弟,从小两人便颇“相得”。《南史》云:“始元帝母阮修容得幸,由丁贵嫔(萧纲生母)之力,故元帝与简文相得。”但两人能够“相得”,还由于他们都颇聪明好学,特别是两人都颇爱好文学,都有相当深厚的文学修养。萧纲继萧统为太子后,萧绎有意趋附,二人更加“相得”,常常互赠礼物,书信往还。萧纲对萧绎抱了颇为深挚的感情,其《答湘东王书》云:“江之远矣,寤寐相思。每得弟书,轻痾遗疾。”又云:“怀劳之深,未尝弥歇。善自保惜,及此不多。”情辞恳款,可窥一斑。两人常常诗赋相和,一起评鹭人物,褒贬文章。萧纲《与湘东王书》云:“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自比曹丕,而将萧绎比作曹植,不仅将其视作文学上的知己和知音,还希望萧绎在文坛发挥领袖作用,并认为只有萧绎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对萧绎有着很高的期许、评价和信任。因此,两人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必然地走向趋同,两人都成为引领当时文学潮流的人物,以致后人常将两人并称,在他们死后不久,初唐史学家就有了“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的说法。

---

李延寿:《南史·梁武帝诸子·庐陵威王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21页。

萧纲:《答湘东王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3011—3012页。

萧纲:《与湘东王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11页。

魏徵等:《隋书·文学传论》,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对于文学的特点,对于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有了比较明确、深刻的认识,这是萧绎与萧纲最为趋同的一点。只要将萧纲的《与湘东王书》与萧绎的《金楼子·立言》加以比较,再参照两人的其他相关论述,便不难发现这一点,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两人都谈到了文笔的问题。萧纲心目中的“文”,是“吟咏情性”的,是以比兴、风雅为则的,是有“篇什之美”的,不具备这些特点的作品,则应为“笔”,从而将具有文学性的“文”,与非文学的“笔”区别开来了。萧绎心目中的“文”,则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也就是能像民间歌谣那样表现婉转的情思,具有华美的辞采、读来琅琅上口的和美声韵和能打动人的强烈感情。由于诗赋最具上述特征,因此萧纲、萧绎便举之以作为“文”的代表,萧纲说“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又在《答张缵谢集书》中批评扬雄、曹植轻视辞赋;而萧绎则明确地说“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又称长于“笔”的阎纂“不便为诗”,实也将诗看成了“文”的代表。在萧纲、萧绎的心目中,“笔”的地位是不如“文”的,萧纲对“既殊比兴,正背风骚”亦即无视“文”的特征的京师文风大张挞伐,而萧绎说“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就都表明了这一点。

(二)两人都特别强调“文”的抒情性。萧纲主张“吟咏情性”,而裴子野曾对一味“吟咏情性”的时风表示不满,在其《雕虫论》中写道:“自是閭閻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摛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萧纲则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主张抒写人的本性真情,反对依循儒家的教义写作。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萧纲更提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sup>⑪</sup>萧绎与之呼应,也在《与刘孝绰书》中提出了“吟咏情性”<sup>⑫</sup>之说,而所谓“情灵摇荡”,也与“文章且须放荡”如出一辙,都强调了无拘束地抒写真情的重要性,都指出了“文”所具有的强烈的抒情性质。自陆机提出“缘情”<sup>⑬</sup>说以来,抒写真情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齐梁时期在理论上得到不断的阐发和强调,刘勰、钟嵘、萧子显等人在这方面都是积极的鼓吹者,而萧纲、萧绎的言论,可以说将此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两人都对民间歌谣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萧绎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sup>⑭</sup>,所谓“风谣”,主要指南朝乐府民歌吴声、西曲,因吴声、西曲多写男女之情,风格婉曲柔媚,足可“摇荡”人心,因此萧绎将其视作“文”的代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足可作为“吟咏情性”者学习的榜样。对民间歌谣的这种看法虽不免有偏颇之处,但与轻视民歌,甚至将其斥为郑卫之音的态度相比,确实又有很大的不同。萧纲认为“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对“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sup>⑮</sup>的作法表示不满,在其《劝医论》中,又说“若为诗,则多须见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须寓目,详其去取,然后丽辞方吐,逸韵乃生”<sup>⑯</sup>,所说的“俗”,肯定也包括了民间歌

<sup>⑮</sup> 萧纲:《与湘东王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11页,第3011页,第3011页,第3011页,第3011页。

<sup>⑭</sup> 萧绎:《金楼子·立言》,《知不足斋丛书》本。

萧纲《答张缵谢集书》云:“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10页。)

裴子野:《雕虫论》,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262页。

<sup>⑪</sup>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10页。

<sup>⑫</sup> 萧绎:《与刘孝绰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47页。

<sup>⑬</sup> 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sup>⑯</sup> 萧纲:《劝医论》,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13页。

谣,甚至主要指民间歌谣,可见萧纲对民间歌谣的态度,与萧绎是一致的。

(四)两人都对华美的辞采非常推崇。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萧纲便说他“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其文“质不宜慕”。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更声称:“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中,又对其从兄弟萧曄诗的文采大加赞美,称之为“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跨躐曹左,含超潘陆”。当时曹植、左思、潘岳、陆机在诗坛都享有盛誉,四人在钟嵘《诗品》中都被列为上品,而萧纲竟说萧曄“跨躐曹左,含超潘陆”,可见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在《临安公主集序》中,萧纲还对“文同积玉,韵比风飞”给予了赞美。萧绎也将“绮縠纷披,宫微靡曼,唇吻遒会”看作是“文”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侍中新渝侯墓志铭》中,也肯定了萧曄的“文同藻绘”,可见两人对文采所持的态度,也是颇为一致的。

(五)两人都认为文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裴子野“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萧纲则认为今古本有不同,并举例说:“以当今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杨、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萧纲主张厚今而薄古,甚至是今而非古,对古今不能采取调和态度,“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萧绎说“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又说“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其间也包含了文学及人们对文学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看法。在《内典碑铭集林序》中,萧绎更明确地说:“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sup>①</sup>两人志在对诗风进行变革,他们认为诗风是发展变化的,从而为自己厚今薄古甚至是今非古的看法和做法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萧绎与萧纲文学思想的趋同,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创作的基本面貌、基本倾向趋于一致。具体说来,就是两人都创作了大量的宫体诗,并成为宫体诗的代表诗人。所谓“宫体”,就是在太子所居的东宫流行的诗体,作品主要以宫廷生活为表现对象,题材大都不离女性闺房,热衷于写女子的体态容貌、服饰用具、神情风韵、歌容舞态、生活细节乃至衽席之事,同时有一部分写景咏物、吟诵佛理、奉和应诏之作。形式上追求声律,讲求对偶,雕琢辞藻,驰逐新巧,崇尚丽靡,形成了一种绮艳柔媚的风格。宫体诗形成这些特点,显然与萧绎、萧纲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同时更与他们对文学特点的认知、亦即他们的文学思想相关,与他们相同或相似的审美趋向相关。两人常常诗赋相和,今存萧纲集中,诗有《和湘东王横吹曲三首》、《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和湘东王首夏诗》、《和湘东王阳云楼檐柳诗》、《和湘东王三韵诗二首》、《和湘东王后园回文诗》、《和湘东王古意咏烛》等,此外还有一些同题之作,如两人诗都有《和林下妓应令》(萧绎作《和林下作妓应令》,题下注云“和昭明”)、《纳凉》、《春别》、《药名诗》等,两人赋都有《对烛赋》、《采莲赋》、《鸳鸯赋》等,极有可能是在同游共处时所作。这些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大体上是颇为接近的。如《和林下妓应令》(萧绎作《和林下作妓应令》):

炎光向夕敛,促宴临前池。泉将影相得,花与面相宜。簾声如鸟哢,舞袂写风枝。欢乐不知醉,千秋长若斯。<sup>②</sup>(萧纲)

姚思廉:《梁书·裴子野传》,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443 页,第 443 页。

萧纲:《与湘东王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 3011 页,第 3011 页,第 3011 页。

萧纲:《答张缵谢示集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 3010 页。

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 3010 页。

萧纲:《临安公主集序》,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 3017 页。

萧绎:《侍中新渝侯墓志铭》,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 3055 页。

萧绎:《金楼子·立言》,《知不足斋丛书》本。

① 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 3053 页。

② 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954 页。

日斜下北阁，高宴出南荣。歌清随涧响，舞影向池生。轻花乱粉色，风篠杂弦声。独念阳台下，愿待洛川笙。（萧绎）

再如《纳凉诗》：

斜日晚骀骀，池塘生半阴。避暑高梧侧，轻风时入襟。落花还就影，惊蝉乍失林。游鱼吹水沫，神蔡上荷心。翠竹垂秋采，丹枣映疏砧。无劳夜游曲，寄此托微吟。（萧纲）

高春斜日下，佳气满栏楹。池红早花落，水绿晚苔生。星稀月稍上，云开河尚横。白鸟翻帷暗，丹萤入帐明。珠褰趋北阁，玳席徙南荣。金铺掩夕扇，玉壶传夜声。（萧绎）

再如《采莲赋》（节录）：

唯欲回渡轻船，共采新莲。傍斜山而屡转，乘横流而不前。于是素腕举，红袖长，回巧笑，堕明珰。荷稠刺密，亟牵衣而绾裳；人喧水溅，惜亏朱而坏妆。物色虽晚，徘徊未反；畏风多而榜危，惊舟移而花远。（萧纲）

紫荆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黄螺。于时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鹄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移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故以水溅兰桡，芦侵罗荐。菊泽未反，梧台迥见。苒湿沾杉，菱长绕钏。泛柏舟而容与，歌采莲于枉渚。（萧绎）

这些作品，均以秾丽的词藻和工整的对偶细致地描摹物态，抒写内心的感受，确实是“绮縠纷披，宫徵靡曼”，确实是“放荡”地“吟咏情性”，是其文学思想的生动外现。实际上，不单是唱和之作或同题之作如此，也不单是诗赋如此，其他作品的风格也有不少趋同者。前人说萧纲“辞采甚美”，“辞藻艳发”，说萧绎“诗笔之丽，罕与为匹”，是抓住了两人共同的特点的。

## 二

萧绎与萧纲的文学思想也有并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萧绎与萧纲对“文”的特征的认识虽然都是明确的，但萧绎只用“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一句话，就说明了“文”与非文的区别在于抒情、声律与词采的华美与否，如此集中、概括，说明他“文”的意识更为明确、强烈，对“文”的特征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入，这应当是萧纲有所不及的。此前，曹丕曾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诗赋欲丽”之说，陆机曾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sup>⑩</sup>之说，刘勰曾在《文心雕龙·附会》中说了作文“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sup>⑪</sup>这样的话，钟嵘在《诗品序》中说过“摇荡性

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51页，第1946页，第2046页。

见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2998页，第3038页。

姚思廉：《梁书·简文帝纪》，第109页。

李延寿：《南史·简文帝纪》，第232页。

何之元：《梁典总论》，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陈文》，第3430页。

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sup>⑩</sup> 陆机：《文赋》，《陆机集》，第2页。

<sup>⑪</sup> 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2页。



情”，“吟咏情性”，“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这样的话，萧绎可以说是集各家成说之大成，其中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代表了当时对于文学审美特征认识的最高水平，萧绎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显然是萧纲有所不及的。“文”、“笔”的概念早在刘宋时即已明确地加以使用，但其含义尚不确定。到齐梁时，大体上有了一个一致的看法，如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所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但正如曹道衡在《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一书中所说：“这种文笔之分与文学与非文学之分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因为无韵之文有时也带有强烈的感情，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出师表》等，有些文章虽称为‘论’亦富有词藻，如贾谊《过秦论》、刘孝标《广绝交论》；有些有韵之文如某些铭诔，虽有韵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和词藻，只是应酬之作。尤其像六朝那些‘志怪’、‘志人’小说，皆属无韵之文，也不能说非文学作品。”也就是说，用抒情、声律和词采来界定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当时应当算是最为科学的一种看法，与我们今天对于文学特别是诗赋特点的认识已颇为接近。因此，“无韵者笔，有韵者文”仅是从外在形式上对“文”、“笔”所作出的区分，而萧绎所作出的区分，则已着眼于作品内在的特质，也应当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甚至是飞跃，萧绎在这方面所具有的意识，所做出的贡献，也应当是萧纲有所不及的。

（二）萧纲为坚持“吟咏情性”的创作原则，对“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的京师文风的批判，对“反拟《内则》之篇”、“更摹《酒诰》之作”的创作倾向的批判，态度颇激烈，锋芒锐利，相比之下，萧绎的态度则较为缓和。而萧纲所谓的“吟咏情性”，在很大程度上实与男女之情的抒发及女色的欣赏与描绘同义，这从其《答新渝侯和诗书》中的一段话可明确看出：

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

萧纲认为萧映写的宫体诗非常出色，足可“跨躐曹左，含超潘陆”，从而为宫体诗的创作树立了一个榜样，表现了他对宫体诗这种诗体的高度自信和自负。食、色为人之本能，亦为人之本性，认为欣赏女子容饰体貌是出自“性情”及人的本性，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如将这视作人的本性的全部或者最为突出的部分，就有些不妥了，进而还要人们“放荡”地即毫无拘忌地表现这一本性，甚至把在这方面做得出色的诗人抬到足可“跨躐曹左，含超潘陆”的地位，就更让人觉得不妥了。相较而言，萧绎在这方面较有保留，这不仅表现在言论上，也表现在创作上。

从数量上说，萧绎所写的宫体诗没有萧纲多。即以宫体诗中最具代表性的写女性和男女之情的作品为例。据逯钦立辑校《梁诗》，萧纲共有诗285首，其中这类诗作有121首（咏物等题材的诗中明显涉及女性和男女之情的也计入），占到全部诗作的42.5%。萧绎共存诗124首，这类诗有36首，占全部诗作的29%。所占比重明显地不如萧纲。从《玉台新咏》对两人这类诗的收录也可看出这一点。《玉台新咏》共收萧纲诗109首，而萧绎诗只收了18首，远比萧纲为少。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跟《玉台新咏》是奉萧纲之命编选这个因素有关，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因素，即在编选《玉台新咏》的当时，萧绎的这类作品就远比萧纲要少，《玉台新咏》对两人这类作品的收录，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反映了两人当时在创作上的实际情况的。

萧纲写作的这类作品不仅数量比萧绎多，在程度上也比萧绎深，这单从诗题就可以看出。萧纲写作的《美女篇》、《和人爱妾换马》、《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戏赠丽人》、《咏内人昼眠》、《伤美人》、《变童》、《倡妇怨情》、《咏美人看画》、《美人晨

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第469页。

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5页。

萧纲：《与湘东王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11页，第3011页。

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10页。

妆》、《和林下妓应令》、《夜听妓》、《赠丽人》、《咏人弃妾》、《倡楼怨节》，诗题就非常扎眼，一看就可揣知写的是什么。有的并不“扎眼”的诗题，其内容也是地道的宫体，如《率尔为咏》：

借问仙将画，讵有此佳人。倾城且倾国，如雨复如神。汉后怜名燕，周王重姓申。挟瑟曾游赵，吹箫屡入秦。玉阶偏望树，长廊每逢春。约黄出意巧，缠弦用法新。迎风时引袖，避日暂披巾。疏花映鬓插，细佩绕衫身。谁知日欲暮，含羞不自陈。

还有一首《药名诗》，其实也是地道的宫体，诗云：

朝风动春草，落日照横塘。重台荡子妾，黄昏独自伤。烛映合欢被，帷飘苏合香。石墨聊书赋，铅华试作妆。徒令惜萱草，蔓延满空房。

萧绎也有类似的诗题，如《代旧姬有怨》、《夕出通波阁下观妓》、《戏作艳诗》、《和林下妓应令》、《闺怨》、《送西归内人》，但数量远比萧纲要少。其中有的诗题“扎眼”，但内容却是较为平实的，如《戏作艳诗》：

入堂值小妇，出门逢故夫。含辞未及吐，绞袖且踟蹰。摇兹扇似月，掩此泪如珠。今怀固无已，故情今有余。

诗篇写出了弃妇的无辜、善良、重情和凄苦的内心世界，对其不幸遭遇寄予了同情。可见，虽名为“艳诗”，其实谈不上“艳”，虽名为“戏作”，却包含着严肃的用意，是不能以一般的“艳”作视之的。

有的同题之作，更能看出二人的差别。且看萧绎的《洛阳道》与萧纲《和湘东王横吹曲三首》中的《洛阳道》：

洛阳佳丽所，大道满春光。游童初挟弹，蚕妾始提筐。金鞍照龙马，罗袂拂春桑。玉车争晚入，潘果溢高箱。（萧纲）

洛阳开大道，城北达城西。青槐随幔拂，绿柳逐风低。玉珂鸣战马，金爪斗场鸡。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萧绎）

再看《紫骝马》：

贱妾朝下机，正值良人归。青丝悬玉镫，朱汗染香衣。骤急珂弥响，踣多尘乱飞。雕菰幸可荐，故心君莫违。（萧纲）

长安美少年，金络铁连钱。宛转青丝鞚，照耀珊瑚鞭。依槐复依柳，蹀躞复随前。方逐幽并去，西北共联翩。（萧绎）

《乐府诗集》卷二一《横吹曲辞》题解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萧绎所作，尚有较多军中乐的浑朴高亢之气，除承汉乐府《陌上桑》有“多逢秦氏妻”一句

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第1939页，第1950页，第2051页，第1911页，第2033页，第1911页，第2033页。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页。

外,大体不涉及对女性的描写。而萧纲所作,其主调都是对于女性的描写。虽为唱和同题之作,但内容色调却是颇为不同的。

萧纲对女性描写的迫近和细致,也是萧绎比不上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咏内人昼眠》:“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帐,插掖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对美女睡态之美的描写过于细腻,差不多是纤毫不失,在萧绎的作品中,是找不到这样的笔墨的。萧纲还屡屡写到“空床”,写到“独眠”,似乎要给人一种“性”的暗示,如:“寄语金闺妾,勿怨寒床虚。”(《雁门太守行》其三)“枕啼常带粉,身眠不著床。”(《拟沈隐侯夜夜曲》)“月辉横射枕,灯光半隐床。”(《夜夜曲》)“羞言独眠枕下泪,把道单栖城上乌。”(《乌夜啼》)“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帐向君低。”(《乌栖曲》其三)“更恐从君别,空床徒自怜。”(《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谁知日欲暮,含羞不自陈。”(《率尔为咏》)“持此横行去,谁念守空床。”(《从顿颙还城》)“斜灯入锦帐,微烟出玉床。”(《倡妇怨情》)“冬朝日照梁,含怨下前床。”(《冬晓》)

同类描写,在萧绎诗中却只找到“尘镜朝朝掩,寒衾夜夜空”(《闺怨》)一例。不难看出,萧绎写作“艳诗”的数量及在这方面所涉足的深度都是远不能与萧纲相比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许并不单一,但萧纲将写作“艳诗”当作“性情卓绝”的目标来追求,希望能借此获得“跨躡曹左,含超潘陆”的地位,而萧绎在这方面的态度则并不那么激进,应当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萧绎与萧纲虽都对辞采的华美极为推崇,但也都注意到了质朴的重要性,而萧绎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其《金楼子·立言》云:

今之俗,搢绅稚齿,闾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尚轻侧,涉经纪则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蛇足,随时之义;牛头马骀,强相附会。事等张君之弧,徒观外泽;亦如南阳之里,难就穷检矣。

在这里萧绎对“浮动”、“轻侧”、“贵在悦目”、“徒观外泽”之文是表示了反对的态度的。在《内典碑铭集林序》中,萧绎更明确地提出了文质兼顾的观点:

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反复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予幼好雕虫,长而弥笃,游心释典,寓目词林。

所论针对佛教碑铭的写作而言,但从“幼好雕虫”,“寓目词林”等语看来,所论又不仅限于佛教碑铭。萧绎认为,“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即过于华艳,会与应有的体制风格不符;而过于质实,则又会变得没有滋味。这与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所说的“若风骨乏采,则鹜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的说法颇为相似。

萧纲在这方面其实也发表过一些很好的看法,他在《与湘东王书》中提出观赏作品要“精讨铄泽,兼量文质”,在《昭明太子集序》中,赞美萧统的作品“丽而不淫”,在《劝医论》中说

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第1940页。

萧绎:《金楼子·立言》。

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53页。

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第321页。

萧纲:《与湘东王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11页。

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须寓目”，所说的“俗”，也应包含了“质”的作品。更值得注意的是，据《颜氏家训·文章》，萧纲还“爱陶渊明文”，而谁都知道陶渊明文是以质朴著称的。但是，萧纲对裴子野“了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的严厉批判，却彻底地暴露了他重文轻质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显示出了他与萧绎的不同，这种不同，同样在两人的创作中显现了出来。萧纲的作品，总的说来是辞藻华丽的，甚至连一些“率尔”而成的作品也不例外。如《三月三日率尔成诗》：

芳年多美色，丽景复妍媸。握兰唯是旦，采艾亦今朝。回沙溜碧水，曲岫散桃夭。绮花非一种，风丝乱百条。云起相思观，日照飞虹桥。繁华炫姝色，燕赵艳妍妖。金鞍汗血马，宝髻珊瑚翘。兰馨起馥袖，莲锦束琼腰。相看隐绿树，见人还自娇。玉柱鸣罗荐，磔碗泛回潮。洛滨非拾羽，满握诒貽椒。

而萧绎的作品，总的说来要质朴一些。前人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初唐姚思廉所撰《梁书》，在《简文帝纪》中说萧纲“辞采甚美”、“轻艳”、“轻华”，而在《元帝纪》中却无类似文字；李延寿所撰《南史》，在《梁本纪下》说萧纲“辞藻艳发”，又引魏徵语说其“浮华”，两相比较，似乎是能说明这一问题的。

### 三

萧绎、萧纲对“文”、“质”强调程度的不同，似乎还影响到了他们对有的诗人的评价。如萧绎曾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萧纲曾说：“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对近世诗人的称美，萧绎提到了何逊，而萧纲没有提到何逊。其实何逊当时诗名是颇显赫的，《梁书》本传载：“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云：‘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何逊文章还曾“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世谓之‘何刘’”。可见，何逊诗在当时颇有重名，得到过包括当时文坛领袖沈约在内的许多知名人士的称许。但萧纲对何逊却并不看重，其原因可能并不单一，但其中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何逊诗的风格与宫体诗的艳丽格格不入。《梁书·何逊传》载范云语云：“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sup>⑪</sup>又何逊还曾与吴均游处，而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sup>⑫</sup>，也是与宫体诗的艳丽了不相涉的。二人曾被推荐给梁武帝，开始还颇得赏识，但不久就受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sup>⑬</sup>的斥责。何逊诗并不一味“丽”，而能兼“今”体“古”体之长，质文兼擅，这是他得到范云赏识的重要原因，也应当是他得到萧绎赏识却不被萧纲看重的重要原因。

萧绎既重“丽”也重“质”，这无疑跟他接受了萧统的影响有关。我们知道，萧统是主张兼重文质的，而这一重要的文学思想，恰恰是在其《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阐述的：

得疏：知须《诗苑英华》及诸文制。发函伸纸，阅览无辍。虽事涉乌有，义异拟伦，而清新

萧纲：《劝医论》，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13页。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6页。

见逯钦立辑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第1945页。

姚思廉：《梁书·简文帝纪》，第109页。

李延寿：《南史·简文帝纪》，第232页，第253页。

⑪ 姚思廉：《梁书·何逊传》，第693页，第693页，第693页，第693页。

萧纲：《与湘东王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11页。

⑫ 姚思廉：《梁书·吴均传》，第698页。

⑬ 李延寿：《南史·何逊传》，第871页。



卓尔,殊为佳作。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尔。观汝诸文,殊与意会。至于此书,弥见其美。远兼邃古,傍暨典坟,学以聚益,居焉可赏。

萧绎闻萧纲文集(当指刘孝绰所编之《昭明太子集》)新成,于是便给萧统写信,欲兼萧统所编之《诗苑英华》求而观之,萧统于是写了这封回信。萧统认为,文章应写得典雅、质朴,但不能过分,过分会显得朴野;还应讲求文采,但也不能过分藻饰,过分会伤于浮艳。恰当的做法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萧统无论吟诗作文,也无论编选文集,都是严格地依循了这一标准和原则的,但他自认为做得还远远不够,所以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尔”,可见他是将这当作最高的标准和原则来追求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未逮”,但却说“观汝诸文,殊与意会”,即萧绎所作的文章都与其“文质彬彬”之意相合,也即合于“文质彬彬”的标准和原则。“至于此书,弥见其美”,即萧绎所写的这封信与其所作的其他文章相比,尤其合于“文质彬彬”的标准和要求,亦即前面所说的“清新卓尔,殊为佳作”。可见,萧绎所写的文章,至少是前期所写的文章,是注意文质兼美的,这不能不与他既重“丽”又重“质”的文学思想有关,而这种文学思想的形成,又不能不说是跟萧统的影响有关的。

萧绎既重“丽”也重“质”,应当跟裴子野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梁书·元帝纪》:“世祖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在“为布衣之交”的人中,裴子野列第一,可见两人的交情不同一般。事实上,萧绎也确曾自称与裴子野是“知己”,在《金楼子·立言》中,载有一段萧绎对裴子野说的话,内容是自己何以“隆暑不辞热,凝冬不惮寒”以著书的原因,颇为推心置腹,确是只有对“知己”才会说的话。裴子野死后,萧绎为之撰写了《墓志铭》。两人关系如此密切,裴子野对“罔不揜落六艺,吟咏情性”文风的批判,及其“不尚丽靡之词”的质朴文风,是不可能不对萧绎产生一定影响的。更重要的是,在裴子野周围有一个文学主张与之相近的文人圈子。《梁书·裴子野传》:“子野与沛国刘显、南阳刘之遴、陈郡殷芸、陈留阮孝绪、吴郡顾协、京兆韦棱,皆博极群书,深相赏好,显尤推重之。”又《梁书·刘之遴传》:“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因为交好。”《梁书·刘显传》:“显与河东裴子野、南阳刘之遴、吴郡顾协,连职禁中,递相师友,时人莫不慕之。”不难看出,这个文人圈子中的人物,都是“博极群书”、学识渊博、“多学古体”的人物,从他们现存的诗文看,文风确也大都较为质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当时是较有影响的,从“时人莫不慕之”一句不难看出。《梁书·裴子野传》:“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皆翕然重之”一句,也可说明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萧绎会受到裴子野一定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萧绎与刘孝绰也颇有交谊。刘孝绰被到洽弹劾免官,时萧绎出守荆州,至镇即给孝绰写信劝慰,而孝绰回信,极言到洽卖友要君,说的也是只有对知己才肯说的话。刘孝绰文名极盛,萧绎在与孝绰书中说:“洛地纸贵,京师名动,彼此一时,何其盛也。”并要求“新有所制,想能示之。勿等清虑,徒虚其请”。而刘孝绰也是主张文质兼具的,他在《昭明太子集序》中所说的“深乎文者,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一段话,与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

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第155页。

姚思廉:《梁书·元帝纪》,第135—136页。

萧绎:《金楼子·立言》。

姚思廉:《梁书·裴子野传》,第443页,第443页。

姚思廉:《梁书·刘之遴传》,第574页。

姚思廉:《梁书·刘显传》,第570页。

萧绎:《与刘孝绰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47页。

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第245页。

诗苑英华 书》所说的一段话恰如桴鼓之相应,这种看法应当也会对萧绎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然,萧绎对“质”的较为看重,这只是相对而言。就总的倾向看,萧绎还是重文轻质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与萧纲并无本质的区别。这不仅表现在他也写作了不少绮艳的宫体诗,也表现在他也可能对典正质朴的作品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这从《颜氏家训·文章》的一段话似乎不难看出:“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时,撰《西府新文》,迄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人们不管是兼重文质的还是重文轻质、重质轻文的,实际上都并不断然地否定“文”或是“质”,而往往是把文质兼美当作自己衡文的标准。比如萧纲,他也以“丽而不淫”来褒美萧统的作品,而萧统在评论萧纲的作品时,也说他是“辞典文艳,既温且雅”。更让人觉得特别的是,被萧纲视作“了无篇什之美”的裴子野,萧绎在《散骑常侍裴子野墓志铭》中 also 说他是“比良班马,等丽卿云”,而裴子野在赞美颜延之、谢灵运时,也说他们是“有藻丽之巨才”。如此说来,他们对“文”、“质”的看法似乎是不分彼此了。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实际上他们有的人更偏向“文”一些,有的人更偏向“质”一些。像萧绎、萧纲这样的同样是重文轻质的人物,可以说萧纲更重“文”一些,很多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已到了重文轻质的地步;而萧绎轻质的程度则比萧纲要轻一些,有时甚至可以说他比较重质。这一点其实前人已经指出过,王夫之即曾由萧统《玄圃讲》一诗谈及萧氏兄弟创作上的差异:“顾就彼互质,昭明尤拙,简文尤巧,元帝介巧拙之间。”当然,在今天看来,萧统的创作不一定就称得上是“拙”,应当说基本上是文质兼美的,但对萧纲、萧绎的评价,则大体合于实际。可以说,萧绎在前期所接受的主要是萧统的影响(裴子野卒于中大通二年,当时萧统还健在,萧绎与裴子野的交往也在这一时期),因此他所关注的是文质兼具的问题;而后期由于萧纲身处太子和文坛领袖的地位,他向萧纲靠拢,转而接受萧纲的影响,因此文学观也就由文质兼具逐渐向重文轻质转变了。

梁中叶后的文学,总的说来是以绮艳为特色,但也并非就完全没有了别的色调,比如阴铿诗的风格就颇近于何逊,被后人并称为“阴何”。同一作家的风格,其实也并不单一,即使是萧纲,他虽以绮艳为宗,但也写过一些文辞较为质朴、气象较为开阔的作品,他甚至还用汉魏《相和歌辞》旧题如《从军行》、《陇西行》、《雁门太守行》等写过一些边塞题材的诗。在这种情况下,萧绎的文学思想及创作风貌与萧纲既有趋同也有差异,可以说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此,如因二人都是宫体诗的代表作者和领军人物,而认为二人没有了差异和个人特色,就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

(作者单位 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元亮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第251页。

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第250页,第152页。

萧绎:《散骑常侍裴子野墓志铭》,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055页。

裴子野:《宋略总论》,严可均校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第3263页。

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船山遗书》本。

杜甫《解闷》即有句云:“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53页)。